

# 兰德公司 与美国的崛起



[美] 亚历克斯·阿贝拉 著    梁筱芸 张小燕 译

新华出版社

SOLDIERS OF REASON

# 兰德公司 与美国的崛起

[美] 亚历克斯·阿贝拉 著 梁筱芸 张小燕 译

The Ra  
and T  
Anne

from  
the  
re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 / (美) 阿贝拉著; 梁筱芸, 张小燕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6.1

书名原文: Soldiers of Reason: The Rand Corpo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ISBN 978-7-5166-2316-9

I. ①兰… II. ①阿…②梁…③张… III. ①方针政策—研究—美国②兰德公司(美国)—介绍 IV. ①D771.222②C93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801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08-4676

SOLDIERS OF REASON: The Rand Corpo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 2008 by Alex Abella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Regal Hoffmann & Associates,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简体中文出版版权归新华出版社

### 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

作者: [美] 亚力克斯·阿贝拉

译者: 梁筱芸、张小燕

出版人: 要力石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编辑: 张敬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0

网址: <http://www.xinhua.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30mm

印张: 14.75

字数: 23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3 月第一版

印次: 201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66-2316-9

定价: 4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 前 言

如果我们战败了，那么我们将会被起诉犯了战争罪。

——空军将军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出自《战争迷雾》

通过美国现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冲突之一的越南战争，我第一次知道兰德的存在，缘由是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集会。1968年在我们的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校区，纽约警方残酷地镇压了一场有争议性的学生活动并导致数百人受伤和被捕。在四月份一个闷热的晚上，轮到我见识虐待的滋味的时候了。当时纽约警察再一次被召集起来去结束一场反战抗议示威活动。当时的场面就像那个时代的许多次抗议活动一样，破碎的窗户、燃烧的垃圾桶、催泪瓦斯烟雾，以及一大群警察用警棍敲打高喊“Up against the wall, mother fuckers!”\* 的示威者的头部。

有些跟我一同参加示威的人弄到了燃烧弹——或者至少他们认为那是燃烧弹，于是他们就跑到为兰德公司工作的计算机房前，把燃烧弹扔进去。当我问兰德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兰德应该受到这样的攻击时，有人告诉我兰德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智囊团，有一群战犯在那里研究如何打败越共，如何让统治阶级——“权势集团”永世不朽。那一次，我那些热血伙伴们并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突然到来的警察把我们都驱散了。逃跑的人被罚去打扫哥伦比亚大学的西端（West End）酒吧作为检讨。普通的革命者在酒吧里把享受湿软的薯条、啤酒和威士忌作为自我安慰的手段，他们也告诉了我一些夸张的事情：兰德就像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和

---

\* 或者简称为UAW/MF，是一个总部位于纽约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编注

斯芬加利 (Svengali) ——这两个人都是疯狂的天才和傀儡大师。

时光飞逝，接着就是大概 30 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在洛杉矶签售新书，写的是关于希特勒针对美国的秘密恐怖主义阴谋的研究。当我正在韦斯特伍德书店签售的时候，我热情地欢迎了一位在兰德工作的朋友，他也来支持我的新书。恐怖主义、兰德和书偶然间联系在一起，让我突然获得了灵感。我心想有谁写过关于兰德的书吗？鉴于现在仍然有很多机密研究还在智囊团里紧锣密鼓地进行，那么有可能写一本关于兰德的书吗？好像困难很多，但是毫无疑问是值得试一试的。兰德如今在忙着做什么呢？

后来我找到兰德的领导者，希望他们能够对此提供合作，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们会同意这件事情。兰德把自己隐藏得神秘感十足。一位兰德职员告诉我说以前兰德确实会给公关公司的人一些钱，以使报纸上不出现关于兰德的消息。

尽管如此，我想要写一本关于兰德的书的计划还是在兰德内部经过了层层周转，首先是从我在兰德工作的朋友开始，接着转到公共关系办公室，然后又向兰德的中高层递进，最后我才在 7 点 30 分的早会上接触到兰德的高级管理人员，就像是在五角大楼一样。这件事情的决议也体现出了典型的兰德模式，管理层首先进行的投票，不仅仅只是是与否的选择，而是会按照次序列出一系列选择范围——1 级是强烈反对，10 级是强烈赞成。在 5 个人的投票中，我得到的平均决议是 7 级。他们告诉我，这是多年来他们投票赞同度第二高的项目决议。其中一个管理者透露说，他认为赞成写这本书要么是兰德史上最明智的决定，要么就是最愚蠢的决定。

兰德向我开放文件，帮助我联系兰德的研究员和分析家，对我所写的内容也没有设置任何限制，前提是我不可以使用机密资料。我带着些许担忧同意了这项前提，担心如果只使用解密文件，写出来的故事会不会毫无趣味、微不足道。我根本不需要担心。许多关于核武器发展的资料目前依然是最高机密文件，但是最重要的是，这只占兰德对整个世界广泛影响的一部分。当我开始研究兰德 60 多年的历史时，可以查看的兰德资料浩如烟海，这些资料涉及各种领域、活动、人物和事件，这让我大吃一惊。这时我才发现许多年前在西端酒吧的朋友们在日常闲谈中说的所谓的事实其实是错误的。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反叛乱研究的不是兰德，而是另外一个智囊团——国防分析研究院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此外在 1968 年被

学生接管后，哥伦比亚大学取消了与国防分析研究院的合同。

但是我的同学们所描述的事情却是八九不离十。兰德开展了大量研究，探索如何打败越共以及如何扩大美国在越南的势力。兰德的创建理由就曾经是针对如何发动和赢得战争向空军提出建议。1970年，兰德运用它在战争领域的经验教训来开展城市规划工作，把纽约市当成研究工作的实验室，在实践中检验它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

兰德过去是、现在仍是一个重要的机构组织。纵观其历史，会发现兰德处在五角大楼贪欲和财政争夺交叉的中心，艾森豪威尔总统把这种现象称为军事—工业—立法复合体。兰德确实重塑了整个现代世界——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兰德坐落在圣塔莫尼卡海滩（Santa Monica），位于市政厅和码头之间。数十年来这个地方都是加利福尼亚海岸线上比较破旧的地方，直到繁荣的房地产把这个破旧的退休人员居住的社区发展成沿海的比弗利山。

兰德旧办公楼的样子像是一辆两层的货车车厢，外面交叉搭着五层厚板，这个办公楼现在已经拆毁了。办公楼的设计与大学校园很相似，只不过兰德没有学生，只有一群时刻思考着各自专业兴衰的教员。<sup>\*</sup> 长长的走廊甚至也要连接到公共区域，以促使人们走出房间，相互进行沟通交流。兰德把旧办公楼的土地出售了，购置新办公楼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卖土地得来的钱。新的办公楼所有的弧线、玻璃和库哈斯（Koolhaas）式的灰冷色调都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这就如同旧办公楼的尖顶和中世纪的现代主义风格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色一样。但是有一样没有变：想要沿着直线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依然很难；所有的构造都是相互交错的，这主要是为了提高人员和信息的流动性。

兰德一直都保持纯理论性，一直都在研究各种假设和幻想。兰德曾经一度可以成为天合（TRW）这样的公司，天合公司是一个国防合同承包商，名下有许多工厂、数千名职工和数百万美元的预算。但是兰德领导人再三权衡，最终选择了精神生活和理论知识的力量，从而为此放弃了名利。

也正是这个原因，一名将军、一名来自旧金山的律师和一位飞机制造商共同谋

---

\* 数学家约翰·威廉姆斯是兰德最早的五名职员之一，他对这种设计有一定的影响。

划创立了这个机构，他们把它看做是军队赞助的科学研究和发展中心、理论知识的工厂以及智囊团。甚至它的名字也是那么响亮而神秘：兰德\*。兰德并不是象牙塔，而是一个顾问组织，他们向政府尤其是美国空军提供怎样更好地发动和赢得战争的建议。

兰德起草公司成立文件时为了掩饰其真实任务，宣称它的目标是“促进和推动科学、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切为了公众的福利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其实兰德的真实目标再明显不过了，对此根本不需要任何讨论——即把分析家培养成继续推动美国势力扩张的倡导者、策划者和奉承者，就像造物者试图根据自己的想象重新塑造世界一样。谁能说不是呢？当时有一个未经验证的三段论（由两个前提得出结论的推理方法）认为美国是好的典范，而每个人都想要变好，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像美国一样。华盛顿的政府官员说，“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好，请相信我们。”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兰德协助艾森豪威尔政府作好应对美苏热核战争恐惧的准备。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兰德学者填满了美国关于干涉东南亚及应战贫困等事务的高级政府职位。在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推广小政府以及外交干涉主义政策，这些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兰德的思想家身上。波斯湾战争、伊拉克自由行动、在所谓的军事变革理论中的五角大楼重组等，这些都是兰德学者们策划已久的研究项目的巅峰。

兰德的作用并不只限于国家安全领域。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为了设计出可以在核袭击中保持通信的方案，一位兰德工程师发明了信息封包交换技术，为日后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奠定了基础。在健康领域，一项为期 10 年的兰德研究导致政府和公民个人共同承担的医疗保险方案广泛传播开来。兰德还领先开创了恐怖主义研究科目，该部门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阴谋理论家和政治极端分子的兴趣范围。今天，兰德的分析师还在延续其寻找问题解决之道的传统，出版了许多图书和手册，为饥饿、战争、毒品交易甚至交通阻塞等许多世界性难题找出最好的也就是说最理性的解决方案。

---

\* 兰德 (RAND) 是指研究和发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但自从兰德建立以来，也有人喜欢把兰德戏称为研究而没有发展 (Research And No Development)。——编注

尽管兰德孕育了国际互联网并有效地把美国从潜在核毁灭中拯救出来，但兰德还有另外一项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影响很少被人们注意到：即兰德改变了每一个西方人对政府的看法——公众对政府的责任以及政府对公众的责任。

为了试图预知在当时无法预测的各种威胁，兰德分析家无意间创造出了一套出色的理论，为实现政府效率最大化和西方意识形态对抗共产主义阵营创立了哲学基础。兰德的理性选择理论使之变成现实。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未经宗教或爱国主义等集体利益所影响的利己主义是现代世界的标志。

理性选择理论的提出本来是为了打败共产主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它却从整体上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例如纳税额、教育孩子的方式、可以享受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战斗方式等。理性选择理论还引起了伊斯兰部落社会的强烈反抗，因为在这些地方集体利益是至高无上的，理性选择对个人利益的崇拜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文化灭绝。

从最为真实、最为具体的方面来说，在这个被称为西方文明的消费主义大漩涡中，我们所有人都是兰德的私生子。通俗地说，兰德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是西方的矩阵法则。兰德的数据和理性概念构成了分析先于感知和理解这样一种现实。

那么请把这本书看做是一颗红色药丸（红色药丸会让你知道整个真相），让它帮助你看清控制着我们所有人的秘密世界。



## 目 录

前 言 // 1

1

第 1 章 伟大的开端 // 3

第 2 章 人力因素 // 13

第 3 章 原罪 // 25

2

第 4 章 餐前的一次谈话 // 45

第 5 章 保密专家 // 49

第 6 章 喜欢开死亡玩笑的人 // 66

第 7 章 兰德轨道 // 73

3

第 8 章 优美的舞蹈 // 89

第 9 章 神童规则 // 93

第 10 章 科学艺术 // 101

第 11 章 苏联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 112

第 12 章 压不倒的力量 // 119

## 4

第 13 章 在迪建的一个夜晚 // 135

第 14 章 成功的代价 // 138

第 15 章 偷窃 // 151

第 16 章 万变不离其宗 // 154

第 17 章 B 组对抗 // 163

## 5

第 18 章 见证终结 // 179

第 19 章 恐怖分子网络 // 188

第 20 章 尤达和绝地武士的反击 // 198

第 21 章 回到伊拉克 // 208

## 6

第 22 章 战略家之死 // 217

第 23 章 兰德何去何从 // 221

# 1

系统分析是兰德对国家决策机构最引人注目和最具争议的贡献之一。得益于系统分析的先进性，兰德领先开创了核领域分析——换句话说就是拓宽了核武器的应用范围。

1948年兰德公司正式成立，它声称自己的宗旨是：“旨在进一步促进科学、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切为了公众的福利和美国的国家安全。”

战争还是和平，数百万人是生存还是死亡，世界是继续存在下去还是毁于令人窒息的核爆炸后的寒冬——研究组的专家们以救世主自居，他们的研究成果左右着人类的命运。



## 第1章 伟大的开端

兰德公司恩泽世间，  
他们整天思考着如何赚取酬金。  
他们坐在那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你和我都是他们手中的棋子。

——《兰德赞歌》玛尔维娜·雷诺兹

1945年10月1日，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不到两个月，美国陆军航空队指挥将军从华盛顿飞往旧金山，他此行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曼哈顿计划。

亨利·H·阿诺德将军是一个身材中等体型肥胖的人，双眼明亮透彻，时常笑容满面。他推崇空军力量至上。美国历史上被授予五星上将军衔仅有九个人，而他就是其中唯一来自空军的五星上将。1912年他取得了军事飞行执照，此后他一直致力于把空军从陆军中独立出来。强力破坏性武器是最有效的战斗手段，他对此深信不疑。听闻有人质疑德国德累斯顿空袭的道德性，阿诺德写道，“我们不能心慈手软，战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具有毁灭性的，甚至是惨无人道的。”

阿诺德将军支持核弹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尤其是陆军航空队负责运送和掌控这种强力武器之后，他对此更是坚定不移。（1947年杜鲁门总统把空军从陆军联盟中独立出来，开展各项活动争分五角大楼庞大预算的一杯羹。）科学精英荟萃使得曼哈顿计划成为现实，阿诺德担心，在和平时期想要效仿曼哈顿计划显然是困难重重的。

华盛顿广泛招募人才致力于讨伐轴心国。国家顶尖科学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

院、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精英们为世界创造了雷达、喷气战斗机和原子弹,极大地促成了国家工业(通用汽车、福特、美国钢铁、通用电气)产能和净产量的飞跃。经过四年的发展,美国从二等军事力量一跃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从而开启了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时代。正如古希腊及其联盟一样,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应运而生,美国的盟友希望美国能够统治世界,而它也必将统治这个世界。

现在这场战役已经打赢了,促成美国胜利的联盟本来就不甚稳定,战后联盟关系开始土崩瓦解。商人想要赚钱,科学家想要做研究,很少有人能够忍受军队的种种限制和低廉收入。阿诺德将军担心如果每个人都回到工业或学术上,美国的敌人会有机可乘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最大的潜在敌手正是其昔日的战时盟友——苏联。

早在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曾警告过人们:“一副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下。”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打破了战时与美国缔结下的联盟关系,他的军队牢牢控制了中欧和东欧,并不断向意大利和法国施加压力。苏联军队似乎随时准备着摧毁所有敌对政治势力,美苏冲突已成必然,何时爆发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这也正是阿诺德飞往加利福尼亚的原因,他希望找出一种方法招募国内精英,把他们召集到可以让他们自由发挥潜能的地方,从而研发出前所未有的新武器。

其实早在一年前的战争期间,阿诺德曾经要求他的首席科学顾问,一个名叫西奥多·冯·卡门的匈牙利人(他同时还是古根海姆实验室的主负责人)构思一项计划,吸引科学家在和平时期继续为空军效力。卡门提出了一项名为《走向新地平线》的报告,提倡建立一个新型科学机构,“以战争期间协助指挥和提供参谋的科学家们为核心”,建立一所不招收学生、只为空军效力的学院。换句话说,这就是日后兰德公司的雏形。阿诺德很欣赏这个计划,但碍于战事紧迫,他只能暂时把它搁置一旁等待时机。1945年9月的某一天,体形清瘦面容坚毅的前试飞员富兰克林·R·科尔博姆从加利福尼亚来到阿诺德的办公室时,将军所等待的时机终于降临。

科尔博姆以前是一名狂热的水兵,每天早上上班之前,他都要在自家游泳池里游泳,风雨无阻,从不间断。童年时期他生活在纽约北部的郊外,他抓住机会离开

了这里，到西部寻找更广阔的天空和更好的机遇，最终成为美国最大飞机制造商道格拉斯飞行器公司总裁唐纳德·道格拉斯的得力助手，以及副总裁兼工程师头领亚瑟·E·雷蒙德的特别助理。

早在1942年阿诺德和科尔博姆就曾经见过面，当时科尔博姆一手促成了麻省理工学院为陆军航空队研发新生雷达技术的事情。他们两人对航空事业拥有同样的热情，对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可以说他们的行为相互呼应——阿诺德在军队中推崇科学家，科尔博姆则呼吁知识分子要支持空军。

同阿诺德一样，科尔博姆担忧军队中的科学精英战后即将分道扬镳，为此他向一些华盛顿政府官员提议，寻找一种方式在战后继续挽留科学精英为政府效力，但是效果甚微。当他最终来到阿诺德的办公室时，他还未来得及完整陈述自己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科学家顾问小组为军队服务的观点，阿诺德将军抢先拍击桌子，兴奋地说：“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最重要的事情。”他建议科尔博姆立刻拜访道格拉斯，争取得到他的支持，两天后他们将在加利福尼亚的汉密尔顿空军基地再次碰面，届时科尔博姆将整理出实现这个项目所需的人员、机器和资金清单。

科尔博姆搭乘最早的一班飞机B-25轰炸机离开了华盛顿，到达道格拉斯的圣塔莫尼卡工厂。在这里他召集了需要参加会议的相关官员，随后调用一架飞机把他们运到旧金山湾地区。当时唯一可用的飞机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飞机，绰号为“圣牛”的道格拉斯C-54飞机，于是科尔博姆及其随从搭乘这架飞机飞往汉密尔顿，比阿诺德早一个小时到达基地，时间刚好足够为会议准备一顿午餐。

当阿诺德将军的飞机降落在汉密尔顿空军基地时，迎接阿诺德的是科尔博姆、雷蒙德及他的亲家道格拉斯（道格拉斯的女儿嫁给了阿诺德的儿子）。阿诺德带来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顾问爱德华·鲍尔斯，他与科尔博姆在1944年合作设立了首例军民战时合作计划B-29特种轰炸工程。

午餐期间，与会人员开始进入正题。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如何建立一个新机构，从事远程导弹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阿诺德非常看好这项技术的前景。阿诺德及其小组坚持只有航空队才能享有这种新武器的控制权，军队的其他分支则无权过问。当阿诺德喝完咖啡后，他承诺从未用完的战时研究经费中抽出1000万美元，

用于设立研究小组及其头几年的运营操作。亚瑟·雷蒙德提议项目取名为兰德工程，兰德即研究与发展（R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科尔博姆自告奋勇担任小组组长，同时他也在寻觅可以胜任正式领导人的合适人选。（岂料他的临时任期最终延续到长达 20 多年之久），兰德公司的规划由此诞生。

起初，兰德工程并没有明确定义其目标，只有在汉密尔顿讨论时确定下来的概要草案——运用民间技术资源研发新式武器。但是怎样研发？除了远程导弹之外，还要研发哪些武器？研发多少？在随后几个月内，阿诺德、科尔博姆、鲍尔斯及道格拉斯就新组织的未来发展频频交换纪要、信件和意见书，探讨机构的前景，但一直都未能确定最终的细节，直到 12 月末柯蒂斯·李梅的加入才使其目标尘埃落定。

在别人眼中，李梅是一个鲁莽、好战而又极为苛刻的人，还有人认为他疯疯癫癫。他是最冷酷无情的好战分子，他犹如斗牛犬般傲慢，有着“永不言败”的拼劲，是电影《奇爱博士》里几个将军的原型。他时常叼着一根香烟，提倡对敌方发起猛烈攻击——不管美国面临的是何方敌手，通常主要是指苏联。

李梅被任命为航空队负责研发的副参谋长，其职责包括监督管理新建的研究小组。他有意无意间表现出善于与政府打交道的才能，使得他一跃成为管理这个新生机构的绝佳人选。

李梅秉承其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冲破阻碍兰德诞生的所有繁文缛节——那时他把所有批准军需预算的相关空军官员召集到一个房间里，不签署明确的兰德计划任命书就不准他们离开。1946 年 3 月 1 日兰德计划终于正式启动。兰德章程清楚地写道：“兰德工程是一个持久的科学研究和发展项目，对空战领域展开广泛的科学研究，旨在为空军提供参考战略、战术和设备。”

兰德不同于其他政府合同机构，它不必向领导部门提交报告，其研究结果将原封不动地直接提交给李梅。李梅有权决定兰德工程是否接受空军提出的研究建议，而兰德也可以单独决定其研究课题以维持总体平衡。空军可以从兰德获得相关智能技术、研究计划及项目信息，从而优化其研究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空军无权过问兰德的决策管理。换句话说，在研究什么以及怎样研究的决策问题上，兰德总是要服从空军的决定。

阿诺德、科尔博姆和李梅颇有远见地预测到，在和平时期政府仍然需要获得独



立民间科学家的持续支持。不出几年政府机构中兴起一种全新的理念：面对着种种国家安全威胁，特别是在苏联军事威胁日益增长的情况下，科技才是有效的应对之道，而不是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大幅裁减军队数量，维持大规模海外驻军需要花费大量经费，相比之下新武器如原子弹等无疑是更为实惠和有效的方法。美国没有效仿英国和法国把重要军事工业国有化，而是把科学研究发展工作承包给私有机构。私有机构不受五角大楼的采购计划和个人要求所约束，可以更快速更实惠地研发出新武器。兰德起着连接军事计划与民间发展的桥梁作用。

杜鲁门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发表过一篇激情洋溢的报告《科学，永无止境》，在报告中他倡导政府维持并不断加大资金，投入他声称的“基础研究”中，也就是说，新知识的发展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基于这个原因，李梅坚持保证兰德的独立性，兰德不负责短期的应急计划，而是致力于长远的研究发展，而军队对此要给予最高程度的支持。在1946年4月30日，当时的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备忘录中指出：

军队在军事计划及武器生产方面需要民间的协助……必须给予科学家和工业家最大的自由去开展研究……假如充分降低条款限制，那么科学家和工业家极有可能为军队的发展作出意想不到的新贡献……既然外界机构有着丰富的经验，在执行某些任务方面也比我们更为胜任，那么就没有什么必要在军队内设立同样的机构了。这样的合作模式，展示了明显的经济优势和军事效率。

如果说阿诺德及其小组是兰德的开创者，那么李梅毫无疑问就是兰德的教父。不同于其他身世显赫的同行，李梅出身低微，他的第一份军职不是从西点军校开始，而是从预备军官训练团起步。

从五岁时第一次看到飞机后，他就深深迷恋上了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飞行是近乎神圣的事情”，为此他立志加入航空队，成为了一名富有传奇色彩的飞行员。1937年军事演习时，在军队提供的战舰坐标有误的情形下，他在加利福尼亚